

# 试论陈垣的宗教史治学方法

## ——以《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为例

罗兴连

(广州博物馆,广东 广州 510040)

**摘要:**一代史学宗师陈垣一生著述宏富,治学严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学术见解。在宗教史研究方面,注重对宗教典籍之外其他史料的运用是他治史学的一大特色,这与胡适大相径庭,两者产生的一场争论耐人寻味。《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写于争论之后,也是陈垣众多基督教研究著作中唯一公开谈论治学方法的一篇文章,文中运用大量档案、诗文等教外典籍研究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情况,体现了他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和治学方法。

**关键词:**陈垣; 治学方法; 教外典籍; 天主教; 胡适

**中图分类号:**K 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6)02-0099-05

陈垣一生在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卓越的建树,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丰富的研究著作。特别是在宗教史研究方面著述最多,影响也最为深远,对中国宗教史学的建立与开拓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治学严谨、见解精辟,强调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中体现了他在宗教史研究中注重对除宗教史料以外其他史料的运用的治学方法。

### 一、与胡适就“内典”与“外书”的争论

《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是陈垣众多基督教研究论著中的其中一篇,原载于1934年《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2号。陈垣此文运用大量档案、官书、文集和笔记等教外典籍研究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这种研究方法大大扩充了宗教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对宗教史研究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这篇文章写作之前,陈垣与胡适就宗教史研究中“内典”现“外书”问题在来往书信中展开了一场争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也可以体会出陈垣独到的治学见解及其写作此文的用意所在。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唐代景教传入中国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天主教的东传,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产生冲突。明清时期关于天主教的记载并不多见,除了一些由教徒记载的以信教、护教为目的而留下的文献,如中国天主教徒杨廷筠的《代疑篇》、署名“文都辣、徐恭义”的《祭祖答问》以外,许大受的《圣朝佐辟》和徐昌治的《圣朝破邪集》等文献中也有少数关于教外儒家士大夫反

对天主教的记载。1846年2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准免查禁天主教后,基督教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和内地许多地方迅速发展。到民初,基督教的研究著作也渐渐增多,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为教会修史,如1896年上海慈母堂出版了黄伯禄编著的《正教奉褒》。1899年王元深(王宠惠的祖父,曾为福汉会成员,后随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传教)撰写了《圣教东来考》,1901年在香港出版,这本书卷首和卷末分别有《景教东来考》和《天主教东来考》。1921年河北献县胜世堂出版了萧若瑟的《圣教史略》,这些研究都是后来被学者们广泛征引的重要参考资料。此时的基督教研究与其他宗教的研究一样还停留在宗教化的层面上,随着后来西方史学方法的传入以及与西方国际汉学界交往增多以后,中国的宗教史研究才慢慢走上了学术化的道路。同时大批敦煌文书的出土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清档案的公布,扩展了整个宗教史研究领域的史料范围,使宗教史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陈垣、冯承钧、王重民、张星娘、方豪等一大批原来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优秀学者也都转而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大量运用新发现的明清档案、官书等教外典籍研究宗教史是陈垣治宗教史的一大特色。在宗教史研究中,“内典”与“外书”的问题历来都是从事宗教史研究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陈垣重视教外典籍的运用,这一点可以从1933年他与胡适的辩论中看出。胡适在他的《四十二章经考》中认为汉代译经中就已出现“佛”、“沙门”等名词,而陈垣则运用汉代君臣诏令奏议称“浮屠”、“浮图”,而不言“佛”,“沙门”

的材料,反驳胡适的观点,认为现存《四十二章经》非汉译亦非襄楷所引之汉译佚经。双方在来往辩论的信函中都涉及了“内典”与“外书”的问题。胡适在《答陈援庵先生书》中认为鱼豢、陈寿、司马彪及范蔚宗均为教外史家,他们的记载“皆未必即可证明其时佛徒尚未用佛为通称”。因而他“以为先生过信此等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译经及《牟子》等,似乎未为平允”。<sup>[1]</sup>陈垣对此问题作了回答:“来示又谓我过信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译经及《牟子》等,诚然诚然。窃以为信供不如信证,故每在教史以外求证,亦孔子所谓‘孝哉闵子骞,人无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之意也。佛家记载如可信,吾何为不信,奈其可信者甚少何。故常谓研求教义,自当寻之内典,言求教史,不能不证之外典也。”<sup>[2]</sup>可见,陈垣认为佛教典籍可信者甚少,从而不得不“证之外典”。佛教如此,基督教典籍在陈垣看来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在《燕京开教略画像正误》一文中就指出该书错误百出,“可谓滑稽之雄也。”<sup>[3]</sup>《燕京开教略》中的画像将晚笑堂蔡襄改须而变成徐光启,以三国时期诸葛瑾捧轴而成为杨廷筠,以三国曹操为李之藻,只是把剑去掉了,由此可见陈垣重“外书”的缘由。

宗教研究有教义和教史两方面,陈垣的宗教研究主要是教史的研究,着重于研究宗教的兴衰及其各时代政治、社会的关系,较少涉及宗教的教义问题。但他的宗教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宗教史领域,也涉及到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的著述中,这种风格尤为显著。例如他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就多考明季遗民“逃禅”之事,并寓爱国之情于其中。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评价的:“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事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sup>[4]</sup>而胡适则不然,胡适对于禅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他将禅学研究作为其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sup>[5]</sup>他在《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的演讲中就一再强调禅学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禅学的发生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佛教史上一个很伟大的运动。”“第一个意义是佛教的简单化、简易化;将繁琐变为简易,将复杂变为简单,使人容易懂得。第二个意义是佛教本为外国输入的宗教,在一千多年中,受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慢慢地中国化,成为一种奇特的,中国新佛教的禅学。”<sup>[6]</sup>胡适从思想史的角度研

究宗教史,从而不得不较多地倚赖内典,双方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也是双方辩论的分歧所在,更何况对于思想史的研究陈垣也是颇有意见的。蔡尚思在《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提到:“他曾亲自对我说:‘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sup>[7]</sup>他在1933年6月给蔡尚思的信中又说:“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阔,不成一专门学问。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吃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即归于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sup>[8]</sup><sup>355</sup>此虽是对弟子的循循教导之语,然其中的话外之音,细心的人似也不难看出。陈垣此话深意与1932年6月2日胡适被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函聘为该院哲学史部通讯会员不无关系。据《吴虞日记》中记载,此事曾轰动一时。当时的报章也登载:“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齐名。该学院会员,能为世界著名之权威学者。柏林大学教授佛郎克近在科学院提议,通过选举胡适博士为会员,实为东亚第一人。”<sup>[8]</sup>作为当时颇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的一代史学宗师,陈垣的内心想必是别有滋味。

胡适虽被陈垣视为“直谅多闻之友”,双方又多推崇清代考据学方法,然两者的方法却仍存在很大的差异。“讲方法是胡适一生治学的主宰”,<sup>[9]</sup>他一生都在鼓吹其所谓的科学方法。他推崇清代汉学家的贡献,认为他们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并总结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箴言。胡适作为当时“开风气之先”的领袖,在主张积极输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他的方法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学的影响。这种在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归纳得出结论的“科学方法”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与陈垣的研究方法有显著的不同。正如桑兵教授在《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一文所指出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不免是找材料而非读书。前者先入为主,后者水到渠成,这是胡适与王国维、陈垣等人的主要差别所在。”<sup>[11]</sup>对于胡适这种不土不洋的“科学方法”,向以土法治学的陈垣内心自然是难以认同的。更何况胡适往往为了标新立异,其科学的方法所推导出的很多结论偏离了科学、客观的轨道,这一点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不满,连一向与胡适交往甚密的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后来也公开批评其研究的结论过于武断。

在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论战中,胡适又扮演起“魔的辩护士”的角色,大力鼓吹他的方法论,类似的辩论在以后的“《水经注》案”以及中西历法的不同见

解中都可见到。此次辩论中关于“内典”与“外书”运用的讨论,正好发生在《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写作的前一年,可见,该文实际上与这次论战不无关系。

陈寅恪先生于1935年就《从》文致函陈垣:“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少矣)。今公此作,以此题材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针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sup>[11]</sup>众所周知,二陈无论学术交往抑或私交都非常密切,信中所提及的“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少矣)”,实际上也道出了陈垣对当时日本佛学研究的看法。

当时日本是国际汉学研究的另一中心,日本佛教研究在明治以后,采用西方的治学方法,以历史进化论的方式、哲学的观念来研究,使之趋向于学术化和艺术化,淡化了其中的宗教气氛。从当时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如常盘大定、铃木大拙、高楠顺次郎、境野黄洋、木村泰贤等人的著作及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及来往信函中可见,但是他们多注重对佛教梵文、巴利文原典、藏文译经等的研究,汉文藏经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对佛教史迹的考察,对于佛教典籍以外的记载却很少留意。由1933年陈垣和胡适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陈垣对于佛家的记载是颇不信任的,他对日本佛学研究的不赞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何况当时陈垣以土法治学,在西学压倒中学以及胡适等人鼓吹科学方法的世风影响下,虽然对于西洋汉学的治学方法怀有景仰之心,但也蕴涵着与国际汉学界争胜之意。<sup>[12]</sup>陈垣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要将国际汉学的中心夺回到中国、夺回到北京的意愿。例如刘乃和在《书屋而今号励耘》一文中讲道1962年在中华书局的一次会议上,郑天挺先生曾回忆道:“一九二一年在北大的一次集会上,曾听陈老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及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sup>[10][15]</sup>因此,由他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态来看,出于对日本汉学中佛学研究的不满,是陈垣先生写《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的另一缘由。

## 二、陈垣治学方法在《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中的体现

《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分上、下两编,共12目。上编六目为:一、可补教史之不足;二、可证教史之偶误;三、“可与教史相参证”;四、

可见疑忌者之心理;五、反对口中可得反证;六、旁观议论可察人言。下编六目为:七、教士之品学;八、教徒之流品;九、教徒之安分;十、奉教之热情;十一、教势之兴盛;十二、教徒之教外著述。在文中陈垣运用大量的档案、官书、文集、笔记等教外典籍,订补了许多教会史籍的阙漏、讹误,并阐明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为宗教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广泛的材料来源。《从》文中所体现的陈垣先生缜密严谨的考证和他搜集、运用史料的方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启发。

陈垣的治学方法以考据方面最有成就。他的弟子对其自述的治学历程这样写道:“他的全过程是: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学,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则胡三省、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生平在学术著作上的大成就,仍然是属于清代以顾炎武、钱大昕等为首的考证学系统。”<sup>[7][21]</sup>严耕望曾在《史学二陈》中将陈垣的考证方法归于“述证”的方法,认为“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瞻,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在纷繁中见条理,得前所未知“新结论”。<sup>[13]</sup>强调史料搜集之详瞻确实是陈垣治史方法之一大特点,“竭泽而渔”是他的一贯主张。“竭泽而渔”是指材料搜集要求完备。他搜集史料范围极广,有正史、杂史、金石、碑刻、方志、档案、文集、诗赋画谱、题名录等。这些资料的运用自然是要经过校勘和取舍的。可见,教外典籍用于治史相当不易。

《从》文中陈垣运用较多的是上谕、奏折及官方文件。短短一篇文章,运用上谕奏折就达数十处。例如,在开篇补教史之不足一目中,就以故宫文献馆陆续在文献丛编中发表的雍正十年六月广东巡抚鄂尔泰奏广东省城设立教堂一摺来看当时在禁教的情况下,天主教仍然兴旺的情形。实际上,陈垣把这些档案运用于治教史,最典型的要数《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和《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两文。前者陈垣从故宫博物馆文献部乐寿堂陈列的两份中西两方禁教与传教的档案中勾勒出中西文化思想矛盾斗争的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则是陈垣根据档案,纠正了教会史记载中关于苏努的封爵和苏努斧子获罪原因的错误。樊国梁译《燕京开教略》中认为苏努为亲王,苏努之子则为世子,而陈垣根据懋勤殿雍正朱批谕旨,指出“康熙末年苏努为贝子。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崩,苏努始为贝勒。”教会史认为苏努父子获罪的原因是苏努父子信仰天主教,维护天主教,又说是有人诬告苏努参与了谋废雍正皇帝的阴谋。陈垣则证明苏努获罪的唯一原因是帮助康熙第八子允祀谋继立,而此事发生在雍正登基之前。<sup>[14]</sup>

其次是诗文的引用,《从》文征引了许缙曾早年遣葬侍儿诗其一“生绡图画写相思,窄袖织腰似旧时。一片烟云迷蝶梦,五更风雨葬花枝。螟蛉婉转随人泣,女伴叮咛絮语迟。屈指伤心寒食近,纸钱斜带绿杨丝。”判断许缙曾因其母太夫人信教而幼年领洗,而晚年则“征歌选色,放任不羁”,“终不敌世俗之熏陶。”陈垣以此来纠正《江南传教志》所载之误。关于许缙曾其人 1935 年陈垣专作《华亭许缙曾传》,运用许缙曾的诗文及其殿试策中的记载以证教史之误。

陈垣治学无论选题、构思、征引材料、论证,还是语言行文,都细心琢磨,方法缜密,力求达到更加科学的境界。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鹭藏先生在《读陈垣氏〈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就称赞陈垣先生的研究方法“为科学方法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核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之点不少,资料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窠而为科学的者也。”<sup>[15]</sup>可见,陈垣治学方法之缜密和科学为学术界所公认。

如何运用教外典籍以及运用教外典籍的意义是《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的主旨所在。然而对大量教外典籍的搜集,需要广博的知识才行,这固非数日之功所能达到。更困难的是教外典籍在治教史中的运用,这种方法一般人恐怕无法轻易把握。这正凸显出陈垣学术研究的深广。

### 三、陈垣宗教史治学方法存在的局限

从陈垣的很多宗教史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基本上都是运用教外典籍,特别是档案等官方文件,这大概和他任教育部次长时曾负责整理故宫明清档案、接触到许多有价值的相关史料有关。他对内典的运用相当少,且多是被纠正的对象。例如《圣教史略》、《燕京开教略》、《江南传教志》等教内的记载,陈垣就曾多次在其基督教研究论著中指出其中的错误。在他看来,研究教史不同于教义的研究,更何况“内典”颇不可靠,从而多求助于“外书”,这是他在前面与胡适的论战中就曾强调过的。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牵涉到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因此无论内典或外书,除了中国史料的记载应该关注外,西方许多重要文献都是基督教研究中不容忽视的。而陈垣对材料的搜集虽说是“竭泽而渔”,但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汉文史料,

对西方文献和著作不曾涉及,例如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y Cordier, 1849—1925)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一书,从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资料来源方面,列举了 1639—1718 年间大量原始资料条目,总共 56 页近千条目录,而里面介绍的这些有关天主教的材料陈垣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此外,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如法国耶稣会学者裴化行(Henri Bernard, 1897—1947)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V le Siecle(1514—1588)1933]和《利玛窦与当代中国社会》[Le Pere Mathieu Ricci et la Societe Chinoise de Son Temps(1522—1610)1937]这些相关成果似乎也甚少关注。其中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除了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外,当时国际汉学界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并不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陈垣除了日文外不懂其他外语。陈智超说陈垣先生“除学医时学过拉丁文,懂得一些日文,并因研究《元朝秘史》学过一点蒙文外,主要是利用汉文史料。”<sup>[16]</sup>陈垣先生专用汉文史料研究域外之学,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这恐怕也与上面提到的他欲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态分不开。他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此编宗旨,固在专以汉文资料证明元代基督教历史也。”<sup>[17]</sup>由此可见,他并非不知道西方文献在宗教史特别是基督教史研究中运用的价值以及关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必要,他也常常鼓励其弟子学习外文。他的弟子牟润孙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一文中就提到:“他认为治学不但要知古,更要知今。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禁忌。”<sup>[18]</sup>由此再回顾陈垣的众多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时会发现他运用的西文史料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倒颇有几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气,且并不妨碍他在国内外史学界一代宗师的地位。

但是宗教史研究作为一门沟通中西交往的学问,专用中国的史料,而忽视国外史料的做,在中外学者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恐怕很难行得通,特别是 40 年代以后随着大量西方传教档案的公开和许多西方汉学家的优秀成果的出现,陈垣《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中所主张的利用教外典籍研究宗教史的方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陈垣在 1945 年以后停笔,桑兵教授认为与伯希和过早谢世,使他失去了这样一位竞争对手不无关系。<sup>[12]</sup>然而他所倡导的这种治史方法受到了挑战是否也可说是他搁笔的原因之一呢?其弟子牟润孙在《发展学

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一文中推究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之后就不再有中西交通史研究成果出现的原因时就认为：“援老后来之放弃中西交通史研究，与其说兴趣转变，不如说受了语言知识的局限。”<sup>[19]</sup>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佐证。

不管怎样，陈垣在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他在宗教史研究中注重对宗教典籍之外其他史料运用的治学方法，虽然在后来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而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宗教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陈垣本人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独到的治学方法和精辟的学术见解更是值得后辈学人好好学习的。

#### 参考文献：

- [1]陈智超. 陈垣来往书信集[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社,1990:184.
- [2]黄夏年. 近现代著名学者文集·陈垣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8.
- [3]陈智超. 陈垣学术论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陈寅恪.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三联书店,2001.272—273.
- [5]柳田圣山. 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的研究. 胡适禅学案[M]台湾:中正书局,1975.6.
- [6]胡适.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M]. 黄夏年主编.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98—199.
- [7]蔡尚思. 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6):20—21.

- [8]吴虞日记(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629.
- [9]唐德刚. 胡适口述自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0.
- [10]桑兵.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J]. 近代史研究,1997,(5).
- [11]陈美延. 陈寅恪集·书信集[M]. 上海:三联书店,2001.129—130.
- [12]桑兵. 陈垣与国际汉学界·励耘学术承习录[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0.
- [13]严耕望. 治史三书[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
- [14]曾庆瑛. 陈垣与明清档案[J]. 历史档案,1982(2):37—41.
- [15]桑原鹭藏. 读陈垣氏《元西域人华化考》[M]. 上海:上海古古籍出版社,2000.145—146.
- [16]陈智超. 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C].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 [17]陈垣. 元也里可温教考.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明季颠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M].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
- [18]牟润孙. 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 励耘书屋问学记[M]. 上海:三联书店,1982.5.
- [19]牟润孙. 海遗杂著: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89.

(责任编辑 黎尚健)

## On Chen Yuan and his The Perception of Catholicism: form the Non-religious Literature at the End of M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LUO Xing-lian

(Guangzhou Museum,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40, P. R. China)

**Abstract:** Chen Yuan, born in Xinhui, Guangdong is a expert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 Perception of Catholicism at the End of M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form the Non-religious Literature' is one of his works on Christianity that openly discusses the methods to do scholarly research. The methods mentioned serve as a guide and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ers, but what was implied in the article about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amo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deserves pondering. Basing on his articl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lve into Chan Yuan's methods and the implication in his article.

**Key words:** Chen Yuan; Catholicism; Hu Shi; file; non-religious literature

# 试论陈垣的宗教史治学方法——以《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为例

作者: [罗兴连](#), LUO Xing-lian  
作者单位: [广州博物馆, 广东, 广州, 510040](#)  
刊名: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GUANGDONG EDUCATION INSTITUTE](#)  
年, 卷(期): 2006, 26(2)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9条)

1. [陈智超](#) [陈垣来往书信集](#) 1990
2. [黄夏年](#) [近现代著名学者文集·陈垣集](#) 1995
3. [陈智超](#) [陈垣学术论文集](#) 1980
4. [陈寅恪](#)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2001
5. [柳田圣山](#) [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的研究](#) 1975
6. [胡适](#)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1995
7. [蔡尚思](#) [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 1980(06)
8. [吴虞日记](#) 1986
9. [唐德刚](#) [胡适口述自传](#) 1993
10. [桑兵](#)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 1997(05)
11. [陈美延](#) [陈寅恪集·书信集](#) 2001
12. [桑兵](#) [陈垣与国际汉学界·励耘学术承习录](#) 2000
13. [严耕望](#) [治史三书](#) 1998
14. [曾庆瑛](#) [陈垣与明清档案](#) 1982(02)
15. [桑原鹭藏](#) [读陈垣氏〈元西域人华化考〉](#) 2000
16. [陈智超](#) [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 1989
17. [陈垣](#) [元也里可温教考](#) 2001
18. [牟润孙](#) [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 1982
19. [牟润孙](#) [海遗杂著: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 1990

##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张荣芳](#) [陈垣与陈乐素父子的学术传承——读陈垣致陈乐素书信](#) -学术研究2005, ""(2)

陈垣、陈乐素父子两人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陈垣通过言传身教,影响了陈乐素的学术道路。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学术思想的传承、治学方法的传授和教书为人的教诲。

2. 学位论文 [董恩强](#) [新考据学派: 学术与思想 \(1919-1949\)](#) 2006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时期,也是现代学术建立与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学术与思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本文以五四至1949年为断限,选取以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主流派别新考据学派作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个流派的学术渊源、学术宗旨、治学取向、治学方法以及对材料的态度,以求揭示新考据学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之所以成为现代学术主流的缘故。

新考据学派的学术思想渊源于“中学”与“西学”,主要体现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清代乾嘉学者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西方实证史学、特别是兰克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国际汉学界的示范与影响。正是由于新考据学派的学术渊源有自,学殖深厚,博通古今,兼采中西,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考据学派非常重视材料,认为材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提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更有甚者,如傅斯年,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因此,他们注重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研究材料,并对材料的范围、材料的运用等阐明看法。他们的材料观体现了新派学者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认知。他们还认为,大凡新学问,大都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因而,他们重视利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从而产生了诸如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及民俗学等新学科,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方法。方法对于研究的至关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新考据学派不仅重视材料,而且注重运用科学方法订材料、研究问题。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有同有异。诸如考证、比较等方法为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方法,而历史演进的方法、假设与求证法为部分学者所用。他们在治学中还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方法特色,为学术研究树立了典范。胡适一生都在提倡科学方法,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口号,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文史”,陈垣高于乾嘉的考据方法,顾颉刚运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研究古史,傅斯年由语言学入手研究思想史的方法等等,均颇具特色。他们的治学方法同中有异,各有千秋,在新派学术园地里,异彩纷呈。

新考据学派的史观充分反映了他们治学的宗旨、取向、态度与精神。在治学宗旨上，他们都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目的”，主求真而不主致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认为学术应远离政治，不受现实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学术旨趣发生转向，讲求经世致用，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中，学术的转向似有不得已的成分，但“致用”仍是以“求真”为基础的。在学术精神上，他们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他们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并为后世所景仰，当与这种精神不无关系。在治学取向上，他们重专精的考据，而不主会通的史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新考据学派成就卓然，影响深远。然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这些都在当时学人之间的品人论学和后世的研究中可得到反映。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djyxyxb200602020.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djyxyxb20060202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e46fa8f2-6295-4580-bd59-9e4d00813ce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